

唐宋大家選譯注

(上)

陳霞村

閻鳳梧



山西人民出版社

陈霞村 阎凤梧

唐宋大家选译注

(上)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61725

唐宋八大家文选译注（上册）

陈霞村 阎凤梧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 字数：372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7年3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6,501—11,700册

书号：10088·915 定价：3.65元

唐宋八大家文选译注（上册）

目 录

“古文运动”与“唐宋八大家”

——序言……………姚奠中（1）

韩愈

原毁……………	（14）
杂说一（龙说）……………	（19）
杂说四（马说）……………	（20）
师说……………	（22）
讳辩……………	（27）
进学解……………	（33）
争臣论……………	（42）
送孟东野序……………	（52）
送李愿归盘谷序……………	（60）
送董邵南序……………	（66）
送石处士序……………	（69）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74）
赠崔复州序……………	（78）

送杨少尹序	(82)
赠张童子序	(86)
送高闲上人序	(91)
《荆潭唱和诗》序	(96)
张中丞传后叙	(99)
答尉迟生书	(110)
与孟东野书	(112)
应科目时与人书	(116)
答李翊书	(118)
圯者王承福传	(125)
毛颖传	(131)
燕喜亭记	(138)
蓝田县丞厅壁记	(144)
祭十二郎文	(148)
祭鳄鱼文	(157)
送穷文	(161)
柳子厚墓志铭	(168)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178)
子产不毁乡校颂	(185)
五箴	(188)

柳宗元

桐叶封弟辩	(197)
捕蛇者说	(200)
观八骏图说	(205)
黑说	(208)

序棋	(210)
骂尸虫文并序	(213)
三戒并序	(220)
螭螭传	(226)
鞭贾	(228)
起废答	(231)
六逆论	(239)
封建论	(245)
晋问	(262)
送薛存义序	(292)
愚溪诗序	(295)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300)
与韩愈论史官书	(310)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318)
种树郭橐驼传	(324)
梓人传	(328)
童区寄传	(337)
宋清传	(341)
李赤传	(346)
段太尉逸事状	(351)
永州铁炉步志	(360)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364)
始得西山宴游记	(366)
钴鉅潭西小丘记	(370)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374)
小石城山记	(376)

欧阳修

朋党论	(382)
纵囚论	(388)
五代史伶官传序	(391)
五代史宦者传论	(396)
集古录目序	(400)
梅圣俞诗集序	(406)
苏子美文集序	(411)
江邻几文集序	(417)
送徐无党南归序	(421)
送杨寔序	(425)
与尹师鲁书	(429)
上范司谏书	(435)
与高司谏书	(443)
答吴充秀才书	(452)
樊侯庙灾记	(457)
相州昼锦堂记	(461)
丰乐亭记	(466)
醉翁亭记	(470)
真州东园记	(475)
偃虹堤记	(479)
菱溪石记	(484)
丛翠亭记	(488)
游儋亭记	(492)
秋声赋	(496)
祭石曼卿文	(500)

祭尹师鲁文	(505)
沈冈阡表	(508)
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	(517)

“古文运动”与“唐宋八大家”

——序 言

在中国汉语文学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古文运动”。一次在中唐，以韩愈、柳宗元为首领；一次在北宋，以欧阳修为主盟。韩柳之后，李翱、皇甫湜等人，写作成绩，不能和韩、柳相颉颃；欧阳之后，曾巩、王安石、苏洵、轼、辙父子，写作成绩虽亦有广狭高下之分，然尚足为欧阳之羽翼。到了明代，便以两代八人并称，号为“唐宋八大家”。最早把他们的文章合为一集的为朱右，但那个本子早已佚失，其后便有茅坤的《唐宋八大家集》，至今流传不绝。八家的次序，朱氏是：韩、柳、欧、曾、王、苏，茅氏则变为：韩、柳、欧、苏、曾、王。以后便成了习惯的提法。经过清代“桐城派”的称扬，“八家”的影响，便从通都大邑，深入到穷乡僻壤，成为一切开笔作文者的典范。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逐渐失去其光采。

所谓“古文运动”，实质上是以复古为旗帜的散文改革运动。散文为什么要改革呢？原因是散文是以记录语言为职志的，语言不断变化，相应的散文也不得不进行变革。比如商周时代的《尚书》，其中不少文章象所谓“周诰”“殷盘”，后人读起来很难懂，韩愈称之为“诘屈聱牙”，因为它记录语言时，虚字，即语气词很少，当时人能懂，后来的人就懂不了。到了春秋战国

时期,在社会大动乱、大变革的急迫需要下,便创造了有大量之、乎、者、也、已、焉、哉等一系列语气词的散文,在记录语言上作到了“无不达己意,无不喻己情”的地步,先秦诸子的文章就是代表。这是散文的一次大跃进、大变革。

但这时又出现了“雅言”和“俗语”、“方言”的矛盾。以《论语》为首的诸子,基本上属于“雅言”系统,而“雅言”的性质相等于今天所谓“普通话”。这是吸收各地“方言”中最共通的成分而形成的一种文体,既适用于一个地区,也适用于九州各国。这就叫作“文言”,不合这个标准的,就会因“言之不文”而“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但它和口头的“方言”、“俗语”却有了一定距离。口头语言变化很快,这种矛盾,也越来越大。秦始皇统一六国,也统一了文字——“书同文”。于是,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一字多义、一义多字的现象,成了汉语的特色,也为散文提供了丰富的词汇。这就是文言散文的传统。这一传统持续了两千多年,为华夏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由于散文终究是以记录语言为职志的,而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要求,不断变化着,要充分用文字表现出来,就需不断地吸收口语中生动活泼的成分,来提高它的表现力。历史上的散文家,在这方面作得越好的,他的成就就越大。而司马迁正是做得最好的伟大典范之一。从班固起,开始有远离口语的倾向,经魏晋到六朝,就出现了畸形的形式主义的发展,形成了所谓“骈文”。在当时的士族门阀统治下,文化只掌握在少数上层分子手里,于是他们的文章脱离现实,脱离社会,脱离人民生活;内容空虚,而只追求字句对偶的美,辞藻华丽的美,用典巧妙的美,音调谐和的美,使文章成为统治阶级的装饰品、玩赏品,全不切实用。尽管其间

个别作者，象鲍照、庾信等人也写有题材严肃、感情真挚的作品。但因文体的限制终难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从总的趋势来看六朝骈文，代表着散文发展史上极端衰敝的文风。

到了唐代，时代完全不同了，而骈俪之风却仍长期占着统治地位。以太宗李世民的英武，文治武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对文学，却只拿来作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自己也附庸风雅，追步齐梁。故齐梁余风，风靡一世，而且延续达百年之久。但由于这种文体难于为现实服务，所以早在六朝骈俪盛行的同时，要求改革的呼声，已不断出现。北周苏绰，曾作《大诰》以立散文的标准；隋文帝杨坚下诏：“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臣李谔也上书请革文弊。初唐“四杰”，为骈文高手，却也有改革要求，至陈子昂遂高举起反齐梁的旗帜。盛唐以来，萧颖士、李华，在创作实践上都能突破六朝藩篱，各自成为名家；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从理论到实践为“古文运动”奠定了丰厚的基础，韩、柳继起，遂使这一次散文改革运动达到高潮。《四库提要》对此作了总结性评论，说：“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歌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除，肖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愈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唐代以“古文”为旗帜的散文改革运动，是散文发展史上对骈俪歧途的拨乱反正。而这个拨乱反正，又和当时的儒学复古潮流紧密联系着，也和时代的需求分不开。盛唐是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关键时期，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从这次大乱后，适于粉饰太平的骈体文，越来越不需要了，需要的是能为政治、经济改革服务的，切于实用的文体；加以当时社会最大的祸害之一，是道佛，特别是佛教地主的横行，因之尊儒反佛和提倡古文合而为一。

提倡古文的人，大都是儒教崇拜者和佛教反对者。由于当时出身于中小地主的封建士大夫，要忠君、爱民、忧国，没有别的法宝，只有传统的儒学。他们在反佛上可能有差别，而在崇儒上则毫无例外，他们把“中兴”“救世”的愿望，都寄托在儒学复兴上，而以新体散文为之鼓吹。苏轼称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不管韩愈是否真能达到如此其高的地位。

在韩、柳的当时，古文虽在文坛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也出现了除韩门李翱、皇甫湜等人以外还有白居易、元稹、吕温、刘禹锡等大批作者，但随着晚唐政治的腐朽黑暗、濒临崩溃的形势，坚持古文以批判现实的作家象皮日休、陆龟蒙一类人越来越少。而由宦海浮沉转上醉生梦死、荒淫堕落的人文人则日见其多。于是适于自欺欺人、以浮华掩真实的骈文，又一度盛行起来。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就代表着这一转变。李商隐曾在他的《樊南甲集序》中说他十六七岁时，就能以古文露头角，后来在藩镇幕府任职，又两次作秘书省郎中官，才改作“今体”，专学任（昉）、范（云）、徐（陵）、庾（信），终于成了骈文专家。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变乱，直到北宋，文章的工巧靡丽超过了六朝，而以李商隐为不祧之祖。赵氏王朝，建立了空前的君主专政，而官僚们更可以在高度的物质享受下，优游俯仰其间。杨亿、刘筠为首的达官集团，在诗歌方面有《西昆酬唱集》为靡丽诗风的代表，而其文也与之相辅，被称为“西昆体”。他们“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欧阳修《苏氏文集序》），“句读妍巧，对偶的当”，“事实繁多，声律谐调”（石介《上赵先生书》）“穷妍极态”、“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石介《怪说》），“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

学”（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这种文章的特点，形式上比六朝更整齐，所谓“骈四俪六”，基本上全是四、六句；内容上不只是空，而且是伪。文章至此，完全走上死路。而政治局势内忧外患，促使朝野人士，产生了维护政权和进行改革的迫切愿望。以此为契机便出现了第二次“古文运动”。这一运动，以柳开、穆修、石介为前驱，从理论上给予时文以沉重打击，为古文开拓道路，而王禹偁则在写作实践上作出了成绩。韩愈当年在尊儒反佛写古文的过程中，曾提出所谓“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道”的“道统”理论，而在宋代的古文运动中，则既强调“道统”又强调“文统”，两“统”都以韩愈为崇拜偶像。到了欧阳修借两次“知贡举”的机会，用政治力量，严禁考生写作骈文而大力提倡古文。三苏、曾、王都是在他提拔影响下成为一代作家的。欧阳修便是当时公认的韩愈“道统”“文统”的继承者。加上他的政治地位（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即副统帅、副首相），影响也特别大。苏轼曾说：“愈（韩愈）后三百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居士集序》）。而《神宗旧史·本传》中说：“至修文一出，天下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章大变”（《欧阳文忠公集·附录》）。所以宋代的“古文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直接继承者，是较之唐代更容易地取得成功的。

这两次“古文”即散文改革运动的代表人物们的贡献，主要在新散文的创作上，但所标榜的却都是“文以明道”，“道”是第一位，而“文”是第二位的。他们都尊儒，而宋人提得更响亮；他们都提到“道统”，而宋人提得更普遍更明确，而且加上了“文统”。他们具体主张当然也有差别。比如同一个“道”，韩愈、欧阳修等所指都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柳宗元、三

苏，则强调的是“理道”（治世之道）和“有补于国”的道；同一尊儒也，韩愈、石介等力排佛老，而柳宗元、苏轼等，却不排佛老。但总的看来，他们多半并不是哲学家或思想家，而重要的是散文家，是在整个散文发展史上，起有革新和创造的作用的，他们的文集，是我们宝贵的文学遗产。

韩愈、柳宗元不仅时代上居“八家”之首，更重要的是他俩的散文创作，足以领袖群伦。前人对韩愈的文章，很重视他的理论文。其实韩的理论文，不在于说理说得怎么高明，而在于他具有一种蓬勃的气势。这种蓬勃的气势，源于炽热的感情；炽热的感情，源于现实的激发和典籍的陶冶。他的《原道》、《原性》、《原毁》、《论佛骨表》，固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也表达了作者分明的爱憎，但与其说是说理精深，倒不如说是“攻势凌厉”。他的抒情性论文，象《伯夷颂》、《获麟解》、《杂说》一、四之类，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的论点，都不能不受它的感染而为其所激动。弱于理、强于气，很有点近于《孟子》。只有《师说》、《争臣论》等篇，词明理举，堪称论文的佳作。

韩愈散文中成绩最大的，应该是他的传记文，包括大量的墓志在内。这里除过违心的谀墓之词外，可以说是十分丰富多采的。传记中象《张中丞传·后序》，名为“后序”，实是补李翰《张巡传》之不足，而补写的一篇传记。序中塑造了张巡、许远、南霁云等三个英雄人物，朴素而生动，非常感人。墓志中他对不同人物的不同事迹、不同性格和不同思想感情，通过集中、突出、剪裁、渲染，而出之以寓于感情的笔调，使所写人物，充满活力。象给他的朋友柳宗元、孟郊、樊宗师等所写的墓志，都是如此。至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写“天下奇男子”王适，《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写骂叛徒被杀的张

彻，用朴素的描写来刻画人物，尤具特色。

韩愈的赠序，是一个创造。他的大量的赠序文，都是抒情文的上品。长篇象《送李愿归盘谷序》，短篇象《送董邵南序》，或故作旷远，或强作劝勉，而郁勃之气，溢于言表。其他如《祭十二郎文》且泣且诉，《进学解》之寓愤于谐，《画记》之把繁杂的人物器用，写得了如指掌，都是很高的艺术品。韩愈的文章，有“怪怪奇奇”的一面，那是新的形式主义，影响不好；而“文从字顺”的一面，则不但“务去陈言”，而且不断吸收新的语言加以提炼，再加上字法、句法和结构的讲求，使散文发展更具有有一种光采。

柳宗元的文章，最大的特色不是感情而是理智。他青少年时期就博极群书，而且善于把书本和现实相印记。他曾说：“信书成自误，经事始知非”（《三赠刘员外》）。因之他的全部作品处处闪耀着理智的光芒。他的理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是周秦以来历史的总结。条分缕析，反复论证，以理服人而非以情动人；《桐叶封弟辩》、《断刑论》以及《非国语》之属，莫不如此。单就文学方面来看，他的最大创造，是寓言和辞赋。象《三戒》、《蝥螋传》、《黑说》等，都是因物肖形，极喜笑怒骂、幽默讽刺之能事。辞赋中除直接抒情以外，也多以寓言行之。象《骂尸虫文》、《有蝮蛇文》、《憎王孙文》等，都是借物刺人，十分深刻，为古今文家所少有。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文，是柳宗元的另一创造。这些游记，不仅体现了他对自然风光观察体味的深刻细致，而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身世情感寄托在山水景物之中，使山水也具有了他的思想性格。至于他的传记文象《段太尉逸事状》；赠序象《送薛存义之任序》都不只是文章好，而重要的是陈义高。他写段秀实关心人民疾苦，沉着、勇敢地地和权势强暴者作斗争，至今读之，仍勃勃有生气。他向薛存义提出：官吏是人

民仆役的观点，更不是一般作者所能企及的。

北宋古文家，并尊韩、柳而侧重于韩。欧阳修又强调“韩李”（李翱），说明他们不仅反对了骈俪，也反对了由韩的“怪奇”而导致的险怪一路，而只走李翱所承继的韩的“文从字顺”。欧阳修致力最大的是传记文，他以《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主编和编著，列身于史学家之林，而作为文坛领袖，自然也以这方面成就更为突出。他写传记文的标准是：“事信，言文”（《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要“事信”，就要调查考证；要“言文”，就要斟酌于详略、剪裁。这在他的《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说得最清楚。“事信”需要客观，而“言文”又不能不带主观色采。他的史传和史论，大都具备着这两个特点。理论文他虽不见长，但《朋党论》、《纵囚论》等，却表现了他的真知灼见。文章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气味，而只是反复论证，抑扬顿挫，从容不迫，以理服人。他的“序”（书序、赠序）、“记”（记亭、园、台、堂）多有名篇，在写作上则夹叙夹议，间以描写，往往有“一唱三叹”之妙。

苏洵、轼、辙父子兄弟齐名，而各有不同风貌。苏洵长于政论，高者可以与《战国策》中的名篇比美。《辨奸论》勇于干预现实，支持改革派，很有斗争精神；《六国论》借战国史实，总结经验教训，以反对宋王朝的对外屈辱政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苏轼博学、多才、有识，结合着他一生所走的不平坦的道路，接触社会面相当宽阔，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的复杂性。他尊儒而喜释道，对事、对人、对物，他常有独立的深刻见解。他不固执，也不圆滑，随遇而安，无所不适。表现在文章中，是十分丰富、复杂、而又汪洋恣肆的。他有一部分理论文，好矜奇立异，抓一个特点作为一篇的中心，反复论证，以达到预期的结论，《留侯

论》可作代表。他把张良一生功业成就的关键，说成是在于“能忍”，在于“忍小忿而就大谋”，道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却不能不佩服他文章所具有的魅力。他的杂文、杂记，往往对事理观察入微，富于哲学韵味，而又妙趣横生。象《日喻》，用瞎子不能靠别人的指点认识太阳，来说明“道可致而不可求”的道理，因为一切事物的规律，主要从不断的实践体验中得来，其精微之处，的确是不可言传的。这种道理《庄子》说得最透，而苏轼文中也写有不少这方面的体会。苏轼的前后两篇《赤壁赋》，是他的另一方面的名作。他用平易精炼的语言，写流连于江山风月之间的人物，怀古伤今，抒发对人生的感慨；终于把沉郁苦闷的心情，溶化于物我两忘的境界，达观而非消沉。写景写情，各极其妙，是散文赋的杰作，是有辞赋以来所未有的。苏辙与乃兄相形之下，当然要减色得多，但他的佳作，亦复能独自树立。他长于叙记文。《黄州快哉亭记》、《武昌九曲亭记》可为代表。《快哉亭记》极写山川形胜，联系对古人古事的怀念，从而抒发其政治失意而不以得失为怀的旷达心情。文章雄放而有风致。他的其它作品，大都委曲明畅，时有秀气。

曾巩的散文，《宋史》说他“为文章上下驰骤，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为文者，鲜能过也。”

（《本传》）实际上他和欧阳修最为接近，也最为欧阳修所赏识。他的《墨池记》说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好，在于“精力自致”，而不是“天成”，强调了“学”的作用。他的《越州赵公救灾记》，是一篇很好的“荒政”总结。写得委曲周至，事理明析。由于他以儒家正统自居，故文章也以“古雅”、“平正”为特点。他的有名的《战国策目录序》，把策士们的言论作为“邪说”而鼓吹“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